

中国当前的语言文字工作任务

李宇明

语言文字工作,是指国家对语言文字管理而进行的工作,主要包括制定语言规划和落实语言规划两个方面。确定语言文字的工作任务,起码应从三个方面考虑:1.语言文字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2.语言文字在社会生活中使用的现实状况;3.已有的语言文字工作基础。根据这几个方面的考虑,当前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主要有四大任务:

一、大力推广普通话

民族语言的统一,是建立统一市场、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西方工业化国家,早在200或100多年前就实现了民族语言的统一。我国古代是以雅语、官话等代行民族共同语的职能,清末开始提出语言统一问题,并逐渐发展为“国语运动”。推广普通话正是历史上语言统一、国语运动等在新时代的延续。

新中国几十年一贯制的语言政策之一就是推广普通话。1955年~1956年,把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定义为“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推广普通话的运动。当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1986年召开的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要求把推广普通话工作的重点放在“重点推行,逐步普及”上,1992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又明确提出新时期国家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是:“大力推行,积极普及,逐步提高。”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要使普通话在2010年前初步普及、2050年前全面普及。

当然,大陆推广普通话取得实效较大是在19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四点:1.因市场开放而带来的全国人口大流动;2.广播电视的逐步普及;3.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使人的文化素质提高;4.教师、播音等行业把普通话作为职业要求,推进了普通话培训及其水平测试。但是,由于我国方言众多,加上其他的社会原因,要实现1997年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提出的推普目标,还需要加大工作力度。

当前推广普通话的重点领域有四个:1.国家公务人员。公务员既是国家的形象,又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实施者,应当在推广普通话中起模范带头作用。2.教育战线。教育战线是文化的制高点,是文化的社会传播源,同时担负着培养下一代的光荣使命,因此教育战线是推广普通话的重点领域。3.新闻出版。新闻出版对社会影响巨大,而且往往被社会看作语言规范的标杆,新闻出版行业应当在推广普通话中起榜样作用。4.公共服务行业。语言是用于交际的,公共服务行业要为天南地北的大众服务,使用普通话应当是对公共服务行业的职业要求。只要这四个重点领域普及了普通话,社会的普通话水平就会有质的进步。

当前推广普通话的主要措施有三:1.抓好一年一度的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传播当代的语言观念和国家的语言政策,制造强大的舆论声势。2.开展城市语言(文字)评估,由大城市带动小城镇,由小城镇带动农村。3.按照“以测促训”的方针积极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要求不同职业达到一定的普通话水平,使普通话与人才市场的准入制度挂钩。自1994年国家决定开展普通话水平测试工作以来,已经测试了500多万人,培养了2300名国家级测试员和20000名地方测试员,对推广普通话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二、实现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

清末以来进行的汉字改革运动，目的大多是要废除方块汉字，改用拼音文字。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当时文化建设的需要对汉字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简化，而且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不能废除汉字。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中明确表示，对汉字的前途“现在还不忙作出结论”，因为“不属于当前文字改革任务的范围”。1977年公布的《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1986年被明确废止，提出“对汉字的简化应持谨慎态度，使汉字的形体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自此以后，实现汉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就成为文字工作的主要任务。

汉字标准化是汉字规范化的升华，是现代语言生活对文字工作的新要求。汉字标准化可以概括为“四定”：定量，定形，定音，定序。

汉字历史悠久，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等多次历史形体的嬗变，不同方言又有一些方言字，汉字传入外族后又出现了一些外族汉字，因此使汉字的总量难以精确计算。而事实上每个时代所用的字是有限的。在现代的语言生活中需要使用多少汉字，应当有一个定数，这就需要对汉字进行定量工作。此外从使用频度来看，汉字可分为常用字、次常用字、罕用字等，这种级等的划分也属于定量工作的一部分。1952年，中央教育部公布了2000字的《常用字表》；1988年发布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7000字）。之后，又有字量越来越大的信息交换用的字符集出现。在现代语言生活中，特别是考虑到信息处理、人名地名用字、科技用字等，究竟应该确定多大的汉字字量，怎样划分字量的使用等级，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汉字的简体、繁体都在不同的社区、不同的场合使用着。大陆对简体字的字形在一定用字范围内进行了规范，但是随着字量范围的扩大，还需要解决诸如偏旁类推等问题。繁体和传承字也需要定形规范。而且简体字、传承字、繁体字在字形上怎样和谐一致，还需要使用汉字的不同社区相互沟通。

字音规范，除了一般的审音工作外，要特别考虑成语用字、地名用字的读音，外国地名、国名用字的读音，古人名、古地名和古代诗文用字的读音。字序问题过去主要是在辞书编纂的领域显得重要，但是随着信息检索和各种排序的社会要求越来越迫切，字序规范的问题也就越来越重要。《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和最近由国家语委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审定委员会审定的《GB13000.1 字符集汉字折笔规范》，奠定了汉字排序的基础，下面主要是在更大字量里面检验和实际运用的问题。此外，还要在“四定”的基础上研究汉字的各种属性，研究汉字教学和全汉字的问题等。

现在社会上用字混乱的现象比10年前有所好转，但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这除了加强社会用字的规范观念之外，重点要管理好新闻出版用字和计算机字库，因为新闻出版用字影响大，计算机字库已成为社会用字的主要来源。而且国家语委正在研究汉字水平测试的问题，适当时候启动对从事出版、编辑、教育、文秘等工作的人员进行职业达标性汉字水平测试，以推进社会用字水平的提高。

三、推行《汉语拼音方案》，扩大汉语拼音的适用范围

在明代，西方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就开始为汉语设计罗马字母方案，教会罗马字一直影响到上世纪初叶，并有多种方案。1892年卢懋章设计出第一个中国人的切音字方案，自此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拼音化运动，包括切音字运动、注音字母运动和国语罗马字运动、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等。新中国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广泛争取意见的基础上，比较近千种拼音方案的优劣长短，用10年之功，成就了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汉语拼音方案》。

《汉语拼音方案》不仅在中国文化建设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也逐渐为国际所承认,在国际事务中得到应用。1977年9月,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建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地名罗马化的国际标准。1979年6月15日,联合国秘书处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中国人名、地名的罗马化标准。1981年,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第19次会议,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标准。

《汉语拼音方案》具有学术上的合理性和广泛的国内外的应用基础,再搞什么新的汉语拼音方案设计,是没有必要的不明智的而且也是行不通的。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汉语拼音方案》是中国人名、地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并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当前的任务就是落实《通用语言文字法》的规定,努力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并根据信息化时代语言生活的新特点探讨汉语拼音所可能的适用范围。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有:1.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在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汉语教学包括汉语母语教学(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的母语教学)、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华侨华裔子弟的汉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2.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在推广普通话和扫除文盲中的作用。3.充分发挥汉语拼音在信息检索、信息处理、信息产品运用和信息教育中的作用。4.完善汉语、少数民族语和外语中专有名词(包括人名、地名及其他专有名词)汉语拼音拼写。5.研究汉语篇章的汉语拼音拼写法。6.研究汉字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和外语文本中夹用汉语拼音的方式及读法等问题。7.研究汉语拼音在盲文、聋哑手指语、灯语、旗语等特殊人群、特殊场合的辅助语中的应用问题。8.研究有关汉语拼音的自动排印、网络传输等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社会的汉语拼音应用水平还很不理想,不少人还不具有汉语拼音的应用能力,而且对汉语拼音的教学、宣传和研究都还相当不够。应当深入分析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使汉语拼音在现代语言生活和国际交流中充分发挥作用。

四、加速语言文字的信息化进程

世界正进入信息化时代。为迎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在制定“十五”计划时,提出了“加速发展信息产业,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发展战略。语言文字是信息的最主要的载体,语言文字的信息化是国家信息化的关键。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汉字的计算机键盘输入、显示、交换及印刷排版技术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下一步的发展是:1.继续完善汉字的机器处理,包括各种键盘编码的优化,低点阵汉字显示规范,计算机字库建设规范,国内、国际的汉字编码、传输协议的进一步完善等。2.推进非键盘输入(包括语音输入、手写联机输入、手写脱机输入、印刷汉字扫描识别等)的科技进程及其商品化。3.建立汉语口语、书面语的海量平衡语料库和专业语料库以及相关的各种数据库,统计汉语汉字的各种信息,并通过语料库深加工和知识库的扩充,培养计算机处理语言的能力,迅速提高计算机语言处理的水平。4.提高自动翻译和机器自动信息检索的质量。

中国有56个民族100多种语言,正在使用的有影响的文字系统近十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也是国家信息化和西部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西部是一个包括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分布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概念,包含内蒙、新疆、西藏、青海、宁夏、甘肃、陕西、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土地面积690多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71.9%。约为全国总人口的29%,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超过8000万,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左右。西部开发不仅要解决资金、物资、管理、人才等问题,而且更须解决语言信息化问题来使信息

畅通。以汉语的信息化带动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建设能够与汉语、英语兼容的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平台及相关项目的开发,具有战略意义。

为加速语言信息处理进程,也为了适应中国加入WTO的新形势,必须不失时机地建立信息技术和信息产品的各种规范标准。通过各种规范标准的建立,来加强技术成果的共享性,减少低水平重复建设,保证语言信息产品的技术规格和市场公平竞争。同时,要加强对语言信息成果的评测,以保证各种规范标准的实施,保护先进技术的利益,推进企业采用先进的技术标准。

语言信息处理是技术工程,但也需要社会工程的配合。这种社会工程包含两个方面:第一,努力使社会语言生活健康规范,为语言信息化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计算机、多媒体和因特网正在快速推广应用,海量真实文本正在成为计算机语言文字处理的对象,社会语言生活对计算机语言文字处理的影响越来越大,计算机介入日常生活越深,每个语言文字使用者所输出的语言文字成为计算机处理文本的可能性也就越大。为使语言信息处理在现在的技术条件下顺利发展,必须使社会语言生活健康规范。第二,大力培养语言科学与信息科学兼通的复合型人才。语言信息处理属于交叉学科,需要语言学界和信息学界联合攻关,更需要既懂语言学又懂信息科学的复合型人才,而现在两界的联合多是“水”与“油”的关系,文理分家的教育制度更不利于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这种状况已经影响了语言信息处理的发展。要尽快通过教育创新解决人才问题。

除了以上四大任务外,科学处理语言文字在各个领域应用中的各种实际问题也是新世纪语言文字的重要工作。语言文字的生命在于应用。语言文字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有不同的特点,不同领域对语言文字有不同的要求。这些不同的特点和要求,便构成了“领域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领域语言学是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学科分支。过去研究较多的是教育领域,之后是信息处理领域,语言教学和语言信息处理已经形成应用语言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在其他的语言文字应用领域,如新闻出版、法律、广告等已有不少成果,但总的说来,领域语言研究的覆盖面较窄,还有一些空白领域;多数领域研究还不够深入,特别是缺少经典式的研究;研究的方法还比较传统,特别是没有很好地利用数据库的方法;研究多是就事论事,较少进行理论的探讨与升华。为发展领域语言学,应当加强应用语言学的理论建设,深入了解各行业语言文字的使用情况及其对语言文字工作的需求,并应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社会咨询服务队伍。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使社会语言生活健康有序。

参考文献

- 费锦昌主编 1997 《中国语文现代化百年记事》,语文出版社。
- 傅永和 1999 《中文信息处理》,广东教育出版社。
- 黎锦熙 1933 《国语运动》,商务印书馆。
- 李宇明 2001a 通用语言文字规范和标准的建设,《语言文字应用》第2期。
- 李宇明 2001b 中国现代的语言规划,《汉语学习》第5期。
- 李宇明 2001c 信息时代需要更高水平的语言文字规范,《术语标准化与信息技术》第3期。
- 刘 坚主编 1998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 陆俭明 2000 跨入新世纪后我国汉语应用研究的三个主要方面,《中国语文》第6期。
- 吕冀平主编 2000 《当前我国语言文字的规范化问题》,上海教育出版社。
- 倪海曙 1984 《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时代书报出版社。
-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200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字法学习读本》, 语文出版社。

- 王 均主编 1995 《当代中国的文字改革》, 当代中国出版社。
- 吴仕民 2001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问题》, 民族出版社。
- 许长安 2000 《语文现代化先驱卢戇章》, 厦门大学出版社。
- 许嘉璐 1999 《语言文字学及其应用研究》, 广东教育出版社。
- 许嘉璐 2000a 现状和设想——试论中文信息处理与现代汉语研究, 《中国语文》第6期。
- 许嘉璐 2000b 《未成集——论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 语文出版社。
- 袁贵仁 2001 以规范标准建设为核心, 开创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新局面, 《语言文字应用》第3期。
- 于根元 1996 《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应用研究》, 书海出版社。
- 周有光 1992 《新语文的建设》, 语文出版社。